

少年少年,步入30岁之后,再从口中迸出这样的词语,甚至会觉得词语本身也是那么迷人,充满着青春的无畏与活力。我和我的同龄人,已经不复少年时,亦不复少年的情怀,开始一点把人生的铁轨接驳到那条无数人经过的轨道上,一列接着一列,在相似的站台,接上年迈的父母,载上初生的孩子,结识许多或漠然或热烈,上上下下的朋友,就这样往未来开去。但人们总会在某一刻回头,就不免要碰见“少年”这两个字。长大成人之后回想,少年的阶段,对一个人的成长竟是如此重要。于是,我带着步入中年的疲惫之心,要写写曾经和现在的少年们,我所见所闻的少年们。

我上班的地方,挨着一所全国最著名的中学,我中午经常和同事一起去那儿的食堂吃午饭。每次走进校园里,就会看到一群少年在奔跑着、叫喊着。他们似乎活力无限,冬天只穿不多的衣服,夏天却套着厚厚的校服。同事老裘经常说:看着附中的这些孩子们,觉得我们真是些老家伙了。看看他们,蹦蹦跳跳的多好。是啊,只不过跨进校门的一刹那,你就会感到,这儿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区别。一个少年就意味着年轻,何况成百上千的他们汇聚在一处呢?少年们昂扬而干净的灵魂,甚至漫过学校的围墙,把这充满汽车和人群的枯燥之地,打扮得带有早春的气息。

有一次,中午,我吃过午饭往单位走,路过旁边的中学。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,手里拎着一沓小广告,走几步就贴在地上一张,走几步又一张,在他身后,牛皮癣一样的广告延伸到很远。这也实在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,我们走在大街上,不是每一天都会见到好多吗?小广告贴在马路上,天桥上,护栏上,路灯杆上,墙壁上,自行车后座上……而贴它们的,通常都是十几岁的少年。从衣着和样貌上,能看出他们来自乡下,不再读书了,到城里来讨一份生活。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就是胶水和印满了办证、刻章之类广告的小纸片,贴得到处都是。他们贴一张,会赚到一张的钱,完全不会想到,自己的作为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破坏,是“非法和可恶”。

我也如所有司空见惯的人们一样,看到他们,会自然地想到地上难堪的“牛皮癣”,但也仅此而已。直到这一天。那个男孩贴着张小广告往前走,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,穿着校服,一看就是学校里的高中生。女孩蹲在地上,把他刚贴的小广告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扔进垃圾桶。男孩发现了,很吃惊。这大概是第一次,除了环卫工外,有人来揭他的小广告吧。他迟疑了一下,然后斗气似的把手里的小广告往地上、护栏上贴。女孩也生气了,跟在他后面往下揭。可是他贴得很快,她揭总要慢一些,女孩更生气了,她放弃小广告,开始追那个男孩,嘴里喊着:不要贴了,你不要贴了,难看死了!男孩看着有点“疯了”的女孩,这出乎了他的预料,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安,或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可能并不那么理直气壮,飞快地跑开了。女孩看他跑了,也停住脚,喘着粗气,脸蛋泛红。她有点累了,喘了几口气,又去把刚才男孩贴的小广告都揭掉扔了,走进校门,消失在校园里。

我回到办公室坐下,脑海里满是这样的场景:一个少年在追另一个少年,前一个来自农村,没读书,在打工;后一个生于北京,很快会考上大学,她追着他,揭掉他贴上的小广告,而他最终落荒而逃。他们几乎一样的年纪,却成了这样的“对手”,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,把本来应该是同类的少年,变得如此不同?站在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成人的角度,我们会多么热爱与欣赏这女孩子的作为,她把一颗干净纯洁的灵魂给这世界;可站在一个来自农村的人的角度,我又明白自己毫无谴责那个男孩的资格。我深切地知道,如果我当年没有幸运地考上大学,而是出来打工,我很可能就是满大街贴小广告的少年中的一个。这件事,不再是简单的对和错,而成了一个疑问,一个困惑。假装真诚地说“只有你把我北京当家,北京才能把你当家人”之类的话,我们当然不会相信。我们都知道,这些打工仔是不可能把城市当家的,尽管他们无比渴望它是家,有多少渴望,就有多少现实告诉他们,他们是幻想。

我想起,读大学时,经常去金五星百货城,那里是穷学生的天堂。于是,就经常在那里看到警察把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抓起来带走,他们是小偷。被带走的时候,他们并不感到难过或羞愧,只是用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围观的人们,到现在,我也无法猜透那眼神里都有怎样的意思。找工作那段时间,我经常步行然后换乘各种公交,偶尔会碰到一位少年迎面走来,到你跟前,突然间敞开发套,露出一台数码相机或一排手机,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:大哥,要相机吗?便宜。第一次我有些吃惊,后来便习惯了,摇摇头,他们就又合上衣衫,风一般地从你身边走过了。也许无需猜测,就可以知道这些相机和手机是从哪儿来的。这样的少年一拨又一拨,我最早遇到的那一些,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,他们在干什么?

在这遥远的异乡都市,永远有少年在流浪,也永远有另一部分坐在课堂里读书。有一些东西,把他们过去的分开的同时,也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分开了。我总感到某种愤愤不平,为人们在少年时得不到平等的成长机遇。特别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,很可能一件微小的事情,就让他们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可能是一次学费交不上,可能是冲动的打架……很多细小的可能,渐渐把他们的路,推向坎坷和歪斜的方向。没有人会为此负责,而他们只能接受。

## 二

妻子是中学老师,每天跟100个这样的少年在一起,因而总会听到她讲他们的故事。有一年的时间,我和妻子住在她们学校的宿舍里,宿舍就在校园中。校园里有很多流浪猫。我惊奇于这些流浪猫都长得胖胖的,以为它们吃的是食堂的剩饭,后来才知道,它们的伙食实在得很。稍加注意,总会看见穿着校服的少年们,从商店里买了火腿肠,掰碎了给流浪猫吃。学校里有一个大池塘,池塘里有红色的小金鱼,他们就买来鱼食喂鱼。这都是很小的事情,很多人都这么做着,但你看见一群孩子这样做时,还是会感动。

今年8月,我和河北省作协创联部、长城杂志社、诗选刊杂志社的负责同志一行5人,到保定市蹲点调研,主要是听取基层作家、文学工作者对河北省作协工作的意见和建议,了解他们的愿望和期盼,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。

8月1日上午,我们来到位于保定市双胜街的老作家申跃家中家。“七一”建党节看望老作家徐光耀时,他曾告诉我,保定有位作家叫申跃中,历时1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中人和家》,写得很好,很感人,希望省作协给予关注。徐老说,我立刻想起了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《社长的一天》和《挂红灯》。徐老说,那些作品就是他写的。

76岁的申老住在一栋老单元房里,家具简单又陈旧,狭窄的客厅坐了4个人就没办法转身。虽然生活条件艰苦,但是老作家的精神看上去十分饱满。他兴致勃勃地讲起创作《中人和家》的曲折过程:“这部小说我整整写了13年,中间病了几次,稿子改了七十遍,辗转了几家出版社,总算签了出版合同,最晚10月份出书。”老人对文学的执著和热爱让我感动。跟老人谈话的过程中,我对基层作家在创作中的困难、老作家群体创作的特点有了更多的了

## ■ 讲述

# 身边的少年

□刘汀



身边的少年 恒兰 作



现在住的小区,离地铁不算远,中间隔着另一个小区。附近上班的人们,一半都要绕过这个小区才能到地铁。这个小区当然有普通的東西两扇门,但管理很严,要刷门卡才能打开。上下班赶时间,或者图方便的人们,经常会等在门口,见有人刷卡开门,赶紧趁机进出。这一点大概让小区的物业很烦恼,可是又有点无奈。

有一天下班,我拎了些重东西,也想贪图省力,就走到门口去。我看见一个老太太,带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铁门里,小女孩手里拿着门卡,她奶奶把她抱起来,才刷卡,门开了,我打开门,站到一旁,想让祖孙俩先出来。可是这位奶奶连忙摆手让我先进,僵持了几秒钟,我赶紧进去,还是用手撑着门。小女孩着急地拉了我一下,我有些疑惑。她奶奶笑着说:她让你关上门。我关了门,她奶奶说:我们不出去,我们就是来给人开门的。我终于明白,这个小女孩,就是个专门来开门,看到有进不来的人,她就努力去刷门卡,把门打开让人们进来。我赶紧说:谢谢你。她说:不客气。后面又来了人,她果然举起了手里的门卡,奶奶把她抱起来,门再次打开。她开心极了。

这样的故事,似乎怎样解读都有歪曲它的嫌疑。但只要一想起她踮起脚,努力去够刷卡器的场景,心里自然就生出非常温馨的感觉。我们曾经也是如此,后来我们长大了,变得事故圆滑,懂得更多,即便不奢求像小女孩一样毫无私心地为人开门,在其他伸手可及的时候,我们就一定会伸出援手吗?我不知道。

如何面对孩子,似乎成了大人们共有的难题。坐地铁、坐公交,时常会面对让座的困境。老人、孕妇、残疾人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让座。但遇到跟着爷爷或奶奶出来的孩子,如果其年级已经不小了,我就会有些犹豫。我们常常见到,你给一个老人让了座位,他很快就让给了自己的孙子,他们又常常坐得理所当然,全不顾祖辈在公交车上摇晃着。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,在这传递中,变成了另外一件事。

## 三

事实上,我最了解的少年,或者说曾经的少年,是我的老弟。在我不停地复读,一定要考取一所理想学校的时候,他只是读了一所中专,他走过的生活之路,就是一个乡村少年艰辛的成长史。所以,我愿意用更多的篇幅讲一讲他的故事。

我上初中时,老弟读小学,很贪玩,学校里又新换了一个毫

无经验的女老师,整个班级成了放羊班,老弟的成绩就很差。对这一点,父亲并不像看到我成绩差时那么愤怒和着急。事实上,大概老弟才出生不久,父亲就打算好了一件事:两个儿子,一个将来出去闯荡,另一个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。因了这个想法,他在老弟的学习上并不很在意。我在读小学期间,因为学习不认真,被父亲打过好几次,但他似乎从来没打过老弟。

乡下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,老弟搭着这趟顺风车,升到了初中。那个中学离家40多里路,条件极差。因为小学时底子薄,他初中的成绩也就不太尽如人意,又远离父母管教,老弟爱玩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。他开始显露其他方面的天赋。比如省吃俭用地攒下5块钱,从同学手里买下一个破旧的随身听,然后自己拆开,鼓捣好些天,竟然修好了,又用10块钱的价格,把它卖给另一个同学。他就这样在玩闹中把初中读完了。

老弟中考那一年,已经是我的第二年高考了。父母曾和老弟商量放弃中考,因为从平日的成绩看,他无论如何也考不上高中。所以想让他直接停学,回来和老叔学习开车,然后当一货车司机。老弟说,还是考一考吧,因为报名费前几个月就交上去了,如果连考场都不进,太亏了。于是他就去考了一下,考完之后,随便填了几个中专学校的志愿,打包行李回家,下地干活,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。但是一个月后,就在我收到一所很差的专科学校的通知书一周后,邮递员给家里送来一个信封,老弟竟然被呼和浩特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。那時候,还没有网络,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来源,全家人都判断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校,担心这只不过是一场骗局。而且,家里陷入一种紧张的气氛:父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着借钱,他觉得这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能考上大学了。我却并不想到这个学校去,父亲犹豫着,这笔辛辛苦苦筹措起来的高利钱,究竟是还回去,还是把它作为老弟的学费,送他上学。我们开了一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,结果是,同意老弟去读一读这个一无所知的学校。

从老家去呼市,要先从林东坐火车到集宁,然后转车。父亲、老叔一起去送老弟到林东坐车。那一年老弟16岁,从没出过比林东还远的门。他们把老弟送到离林东十几里地的小站,看着他孤身一人踏上绿皮火车,再看着老旧的内燃机车缓缓地驶出站台,父亲突然脸色雪白。老叔问父亲:“二哥,你没事吧?”“没事。”父亲说,但有气无力。他俩回到镇子,到小饭馆里吃晚饭,要了一瓶白酒,才吃了几口菜,父亲就痛苦地伏在了桌子上,老叔吓了一跳,赶紧过去搀扶他。过了好一阵,父亲才缓过来,喝了幾次酒,脸上终于有了血色,他说自己从车站那儿就有点心脏不舒服。母亲后来跟我 and 老弟说:“你爸那次太吓人了,想起文泽一个人上学去,担心得犯病了。”事实上,父亲并没有心脏病,是过度紧张所致。可能是在那一次,他才实实在实在在意识到,自己这个刚刚成年的,准备留在身边养老的小儿子,孤身去外面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闯荡了。

那时候,村里没有电话,不可能及时获得远方的消息。老弟路上西去的火车,四五天都没有信儿,全家人都在担心,亲戚们见到父母,也总是问:“文泽去上学咋样了?来信了没?”母亲总是故作镇定地说:“小点儿,没多大事,写信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回来。”又过了一天,在矿上工作的四爷爷家的四姑回来,说老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,已经到学校了,放心吧。大家这才放下心来。

这年冬天,我还在复读班的最后一排鏖战,门口的同学喊,说有人找我。我出去,看见老弟笑嘻嘻地站在楼梯拐角处,身上背着简陋的双肩包。我过去,两个人破天荒地拥抱了一下,问他啥时候回来的,他说刚下火车。他长高了,也更强壮些,板寸头发,最重要的是,我看见他嘴唇上有了黑黑的胡茬,只不过半年工夫,他已经有了青年的模样。老弟下午坐车回家,我把自己在火车上没有吃的面包、橘子和一瓶汽水都给了我,我一边咀嚼吞咽这些食物,一边想象他在拥挤嘈杂的火车上站了17个小时的辛苦。

等我也放假,全家团聚时,老弟才细细讲述他上学的路途。离开集宁下车,到窗口买了去呼和浩特票,就一直不敢离开车站。晚上9点多,他才从呼和浩特下车,可他们学校离市区几十里地,他找了一辆三轮摩托,半夜找到了学校。一边听老弟讲述,母亲一边感叹:“大半夜的,你也不找个地方住下,让人家把你害了怎么办。”老弟说:“找个旅馆住,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呀。”他和我一样懂得,家里每一分钱得来的艰难。

3年后,老弟从那儿毕业,和几个同学被人介绍到刚刚起步不久的蒙牛公司去工作。在那儿,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:收牛奶时,因为不愿意收掺了水的奶,还被人追着打。毕业工作的3年,他没回过一次家,因为他自己心里暗暗发誓,要做出点成绩来再回去。可一个打工仔,要做出一番事业,是何等的艰难。那时候,因为我和老弟都已离家千里,父亲下定决心装了部电话。有一个除夕夜,给老弟打电话,他说他刚刚加班回来,母亲听完就掉眼泪了。老弟后来告诉我,因为交房租后身无分文,他从同事那儿借了100块钱,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,回到他们那个阴暗冰冷的出租屋里,吃完烧鸡,喝光白酒,倒头就睡。为了抵御饥饿,他过几天的几天,基本上都是在冰冷的床上度过的。

2002年5月,我已经在北师大读书了,五一假期决定去呼和浩特去看老弟。我住在内蒙古大学高中中学的宿舍里,回的那天喝了很多酒,第二天酒醒后,我坐上一辆公交,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,到了蒙牛的产业园。下了车,我四处打望了好久,才终于看见在一排小饭馆、小商店下的一次弟,头发很乱,脸色也不好,胡子拉碴,嘴里叼着一根烟。这老弟,我没有拥抱,而是说:“我都没看见你。”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,老弟生活得并不会很好,但看到他的憔悴和颓废,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他带着我在工作地转了转,那里贴满了“员工以为企业奉献为荣”之类的标语。然后去他和一个同事合租的小屋子。小饭店那条街的后面,新建起许多明亮的大楼,绕过这座楼,再穿过一个布满垃圾和水坑的胡同,是一排低矮、低矮的平房,老弟的住处,就是其中之一间。屋子里很暗,大概只有六七平米,靠西面和北面的墙下,摆着两张床。不,不是摆着,也不是床,不过是地下摆了4摞砖头,砖头上搭了几块木板,木板上铺一

联系点,几代河北作家都曾在这里体验过生活,同时也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当年的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。遂城镇的镇党委书记杨守知是省作协会员,从政之余坚持写作,取得不俗的创作成绩,还当过河北文学院的签约作家。在他的带动下,当地的文学氛围很浓厚。

座谈中,我询问作家们在创作中有什么困难,对省作协工作有什么建议。大家的发言积极踊跃,提出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:基层作者投稿难、命中率低;刊物订阅、邮寄困难;学习培训机会少;文学信息闭塞等。最后,大家希望省作协能更加关注基层作者作品,拿出一些版面刊发基层作者的文章;希望定期通过网络的形式开展文学交流与培训;希望组织知名作家、编辑深入县、乡,对基层作者创作给予指导和帮助。我把作者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,有些问题让创联部、《长城》和《诗选刊》的负责同志进行了现场解答。不能现场解决的,向大家表态回去后一定认真研究,争取尽快落实。

8月2日上午,我们回到保定市,参加市作协的文友会。保定作协的两个负责同志,市作协从2006年开始,坚持每两个月举办一次文友

床褥子,褥子上是被子、枕头和暗绿色的军大衣。这就是老弟抵御黑夜时所能有的一切。靠门口的地方,有一个小炉子,是用铁皮桶自己做的。屋子里很冷,老弟想点着炉子暖和一下,但费了好久的劲,煤块只是在半死不活地冒烟,炉火并没能旺起来。老弟说,咱们去吃饭吧,饭馆里热乎,这破炉子总这样,爱冒烟。他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,是一种被迫的流泪状态。

我们到附近的小饭馆住,要了砂锅和米飯,闲聊着吃完。我记不清有没有谈到“未来”两个字,但我们肯定说起了将来的日子。我问他的打算,老弟说,先干着看吧。我又问他今年过年回不回去,他没出声,点起烟,吸进去,吐出来,过了好一会儿,才说:“到时候看吧。”我发现他右手的小拇指指甲很长,问他留这个干嘛。不干什么,好玩,他说。我当时有点难过,他依然封存着自己的内心世界,我知道,他不想让我为此担心,不想把自己现在穷困的生活和迷惘的未来给我看。他努力营造着一种“我很好,至少还行”的氛围,我不能去破坏这个,因为结果会更令人难过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兄弟俩彼此的尊重和坚强。饭吃得索然无味,老弟把账结了。本来,我想去结这顿饭钱,但后来忍住了,我知道,抢着掏钱,会伤害他的自尊心。

然后返程的车就来了,我坐上车,没敢回头看还在挥手的弟弟,虽然我最想回头看看,但内心的酸楚让我不敢这么做,怕眼泪掉下来。我想不曾看见,但之后的若干年,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幅画面:透过斑驳的车后窗,我看见老弟单薄而倔强的身影,一手掐着烟,一手向我挥舞;在他身后,是一整片尚未开发的土地,远方的山在5月的风中仍毫无绿意。他的脸是模糊的,我的也是,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,前后加起来不超过4个小时。

回到北京,我向父母报告这次行程,只说老弟在那儿还行,挺好的,让他们放心。还能说别的什么呢?如果我说他过得很凄苦,老弟会觉得自已被出卖了,而父母也许会惶惶不可终日。年龄渐长,我才发现内心深处的愧疚,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,是我的存在,剥夺了老弟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。比如,如果不是我复读了好几次,用尽了家里的所有收入,老弟本可以在初中复读一年,然后考高中、读大学的。但事实是,他接受了家庭所给予的命运,甚至在努力想靠自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。

第二年,父亲实在不放心,喊上了二舅,两个人坐火车去看老弟。老弟想让农村来的父亲和舅舅能在呼市好好休息一下,提前借了些钱,带他们下馆子,带他们去呼市的景点,三个人的门票花了100多块钱。回来后,父亲和二舅都忍不住感慨:“啥破玩意啊,啥破玩意啊,白花了100多块钱。”老弟当然很清楚这些景点并没有什么可看的,但他还是要带他们进去,不是为了看,只是作为儿子想让远道而来的父亲有一个值得的旅行。他是多么迫切地想向他们展示,我过得很好,不用担心。

老弟那部分的收入,一个月1000块左右,除去房租、伙食费,剩下的大部分钱他都花在了网吧,下班之后就玩游戏。因为除了游戏,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在那种环境下给他宽慰和快乐,即使这宽慰和快乐在本质上虚妄又短暂。他还学会了吸烟,再也没戒掉。我曾问他,为什么要吸烟。他说:“没劲,觉得活着挺没劲的时候,就想抽烟。”他开始思考“活着”这件事。我理解到,烟和酒,是我们生活的道具,也是我们灵魂的驿站,当我们觉得灵魂在躯壳里待得太难受,就总想把它拎出来,放在另一个容器里舒服一下。那容器可能是烟,可能是酒,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。于是,我不再固执地劝他戒烟,因为明白了人的情绪总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。

干了几年,老弟的收入总算稍微好了点,不用再因为没发工资而3天不吃饭了,可他也渐渐明白,在那儿待下去毫无发展。我在网上和他说了:“今年回家过年吧,你不知道一家人多想过团圆年。”老弟后来跟我说,那本还在坚持自己的誓言,要做出点成绩来才回家,可他的那番话,让他改变了主意。他请假回了家,和家人一起过年。我能想象他心里的挣扎,三四年的坚持,最后像个失败者一样回来,这令他羞愧和难受。年后,他又回到呼市去,想把握住一次极好的转岗机会,可惜他不懂向管事的人“表示”,不愿意求人,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他很失望,也很愤怒,打包了行李,彻底回来了。

那一年,三爷爷家当了个小官的三叔也回家过年,父亲去求他帮忙,给老弟介绍个工作。三叔磨不开亲戚的情面,给老弟介绍了一个活,是到吉林的一座矿上,老弟又是只身一人去了。干了半个月,他打电话说想回去了,矿区在山上,非常冷,他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,手脚都长了冻疮。父亲总在电话里说,先干两天吧,先干两天吧,开春就好了。老弟不愿再让他们担心和操心,就在那儿干了下来。他告诉我,自己什么活都干,那个领导安排下来的任务都做。从去那儿到现在的7年时间里,他没有过周末,即便是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这样的假期,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。

老弟去矿上后,常和我在网上联系,我那时常在北师大文艺学的论坛上混,还做了版主,发自己写的文字。忽然有一天,老弟给我发了个邮件,让我去看看,我打开,是他写的小说和诗歌。即使以我当时的阅历和水平,也能看出他文字和思考的稚嫩,但只读着那些东西,还是欣喜不已。我欣喜于他在山沟里,在举目只有石头和树的矿井周围,能培养起这样的爱好,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从自己的体验里深深地知道,他喜欢这个,就不会彻底陷入枯燥生活和无聊工作的悲苦之中,就会将坚硬的现实的壳,凿开一个小小的孔,透过它呼吸到另一种空气。我鼓励他也发到网上去,他听从了,发上去,从很多网友那儿获得小小的认可。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成熟时,我想,他的内心也一定越来越强大,再有了迷惑和困难,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和力量。

多年的辛劳与坚持,让他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,并且结了婚,现在已经是一对儿女的父亲了。看到他生活日渐安定,我感到欣慰,更重要的是,虽然经历无数的摔打,他还是最初那个踏上列车的少年,在复杂的生活中心,努力保持着单纯和善良,还多了稳重和成熟。这在如今的世上,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
## 四

好吧,就写到这里,已经很长了。在大街上,在任何一处,看见少年们风一样地走过,都会多看上一眼,然后提醒自己,不忘当初少年时。

## ■ 现场

# 接近大地的作家们

□魏平

解,特别是对基层作家的创作环境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临行前,老人执意把我们送到楼下,握着我的手说:“作协就是作家的娘家,希望娘家人经常来串门。”我们听了内心感到很温暖,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。

下午,我们来到保定博野县张岳村调研。张岳村是博野县城东边的一个村子,有3000多人口,以生产橡胶制品闻名。30多年前,作家铁凝曾在这里插队下乡。4年的下乡经历,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
我们来到村委会参加座谈会。村主任特意找来了当年与铁凝插队时一起劳动过的村民。刚开始,大家都有些拘谨,不知道从何谈起。面对大家的沉默,我决定试试“拉家常”的办

法,直接从她们最熟悉的生活入手:“当年铁凝跟你们在一起干活儿吗?她那年有多大?”

“铁凝啊,跟我们一起干活,她没有城市女孩的娇气,我们都很喜欢她。”她那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。”铁凝为人厚道,重感情,离开张岳村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同当年的伙伴们保持联络……”因为聊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,村民们的积极性一下被调动起来,话匣子也被打开了。我深深理解到,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火热的生活实践。我也深深地感到,要与群众沟通,就必须放下架子,要用老百姓的话,说老百姓的事,只有这样才能听到群众的心里话。

傍晚,我们来到徐水县遂城镇,当地作者进行座谈。徐水县很早以前就是河北作家的

联系点,几代河北作家都曾在这里体验过生活,同时也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当年的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。遂城镇的镇党委书记杨守知是省作协会员,从政之余坚持写作,取得不俗的创作成绩,还当过河北文学院的签约作家。在他的带动下,当地的文学氛围很浓厚。

座谈中,我询问作家们在创作中有什么困难,对省作协工作有什么建议。大家的发言积极踊跃,提出的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:基层作者投稿难、命中率低;刊物订阅、邮寄困难;学习培训机会少;文学信息闭塞等。最后,大家希望省作协能更加关注基层作者作品,拿出一些版面刊发基层作者的文章;希望定期通过网络的形式开展文学交流与培训;希望组织知名作家、编辑深入县、乡,对基层作者创作给予指导和帮助。我把作者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,有些问题让创联部、《长城》和《诗选刊》的负责同志进行了现场解答。不能现场解决的,向大家表态回去后一定认真研究,争取尽快落实。

8月2日上午,我们回到保定市,参加市作协的文友会。保定作协的两个负责同志,市作协从2006年开始,坚持每两个月举办一次文友

会,面向全市的文学写作和爱好者,没有门槛,不设身份限制,会后,愿意参与聚餐的文友们在在一起吃顿饭,饭费由参与者AA制分摊。当天的会议,到场的至少有50人,大家挤着坐,有的甚至在门口站着。会议讨论的是主题征文小说和女诗人如意的组诗。这儿的研讨会不排座位,不摆人名卡,主持人宣布开会后也没有更多开场白和领导讲话,会议一开始就直奔主题,文友们争先恐后地发言,对作品有称赞,也有挑剔和质疑。其中,有两位文友对作品有相反的理解争执不下,讨论激烈起来。会场还有一位残疾人,他的双腿萎缩,只有一只手臂可以正常活动,要靠别人抱起来才能挪动。市作协的刘素娥说,他是一位诗歌写作者,正是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和坚持不懈,给了他生活的力量和信心。这些普通的文学爱好者,怀揣着文学梦想,把创作当作一种信念、一种支撑,他们对于文学虔诚的追求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我们有这样一支庞大的文学队伍,他们对文学的态度那么诚恳,提高水平的愿望那么强烈,他们对省作协的工作充满了殷切希望。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,建立深入基层的长效机制,把工作触角向基层延伸。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